

江西地方社会的权势格局与五四运动(1917~1920)

张蓝天

[摘要]五四前夕，江西地方社会格局内部的互动博弈相当复杂，形成了各自的运作策略。赣督陈光远需要与地方社会相互借力，取得物资、人际联结方面的支持，而绅商界内部也充满着派系及利益之争。以反对开采城门山铁矿为节点，维护国家和赣人权利的呼声逐渐蔚然成风。在五四运动初期，军商教界都对学生行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帮助，成为运动兴起发展的助力之一，学生的积极行动亦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。随着运动的深入，此前久已存在的米谷禁运、救济浔路两大议题被赋予了维护国权、公民联合等新的意义，但社会格局中已有的种种裂痕也逐渐浮现，学生界与商界、议会关系恶化，多方围绕自身利益展开角力，相关诉求难以实现，折射出学生现实行动和联合理想的困境。五大潮也反过来影响了地方社会格局，学生界激烈反抗，国民意识及“赣人自治”观念成为主流，叠加以假话为名的各方运作，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江西军政教界的既有权势格局。

[关键词]江西；地方社会；五四运动；军绅商学界互动

[中图分类号]K261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3-708(2022)01-0027-13

五四运动作为一场以北京、上海为中心，扩展至全国、由民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，其“在地化”的实际情况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。相对于处于运动中心或前沿的京沪、沿海地区，内陆地区五四运动研究仍相对分散^①。有鉴于此，本文以江西地区五四运动的考察为例，着眼于作为“事件”的五四运动发生、运作及影响等史实的概述与重建，或着眼于个别赣籍人物在运动中的表现与作用，或分析五四运动在地方的后续效应，等等^②。江西五四运动包含了若干具有地方社会特质之议题，这些议题则内嵌于此前江西社会军绅商学互动的格局之中，值得进一步挖掘。

一、五四前江西地方社会格局

作为江西五四运动发生背景之一的权势格局，主要涉及地方政权与南北方政府、地方商会、省议会、教育会、学生界等主体。

1917年陈光远出任江西督军，学界一般认为，其与苏、鄂联结为直系基本势力，此为皖直抗衡之始^③，并常称陈光远在皖直之争中，不过附和苏督李纯^④，“李去则赣之陈无能为，惟虑

① 郭若平、徐文彬：《新世纪以来五四运动研究综述》，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19年第4期，第119页。

② 相关研究参见殷丽萍：《五四运动在江西》，《江西社会科学》1993年第6期；李健：《论南昌的五四运动》，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00年第1期；曾辉：《关于江西五四爱国运动若干问题再探讨》，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19年第5期；晓农：《五四运动中的“江西三只虎”》，《党史文苑》2006年第13期；齐悦：《段锡朋与五四运动》，《同舟共进》2018年第11期；陈维裕：《五四运动的闯将——罗隆基》，《兰台世界》2006年第23期；于海兵：《革命青年的修身与自治——以〈袁玉冰日记〉为中心》，《学术月刊》2018年第5期；于海兵：《五四时期地方学生的革命之路——以南昌改造社及其团体生活为例》，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20年第6期；刘勉钰、陈立明：《改造社及其革命活动》，《南昌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》1980年第3期。

③ 李剑农：《近百年中国政治史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446页。

④ 《当代名人小传》(下)，崇文书局1926年版，第76~77页。

其才不足当此要冲”^①。然而，“长江三督”之间并非了无罅隙。和李纯所执掌的江苏不同，湖北、江西与川湘、闽粤毗邻，堪称处于南北之争的前线阵地，直接面临辖境安全、兵力筹备和财粮接济等现实问题。自段祺瑞主持发动湖南战役以来，陈光远对和战的态度一直处于摇摆之中。1917年11月，陈光远尚极力阻止安武军入湘假道^②，而至12月初，因“南军形势咄咄逼人，再不努力，且牵动本身位置”，一度表现出主战之意，并商倪嗣冲派兵增援^③。随着岳州形势日益紧迫，赣南方面亦传李烈钧准备进攻，其又转向谋和。可见，时局变化中其固有地位能否保存当为影响其态度的直接因素。此外，在南北调和中，其相对于苏、鄂两督，陈光远亦表现出一定自主性。三督之中，陈光远的综合实力相对较弱，弱势实权的角色影响了陈光远在时局中处理中央与地方、地方内部问题上的因应策略。

在所辖兵力上，李纯统中央陆军第六师，兵力共约12000人，此外包括13000人左右的地方军队；王占元所统军队约达55000人，而陈光远所统中央陆军第十二师，兵力仅10000人左右^④，南北兵戎相见，不仅兵力不敷分配，更有外来者势力坐大的危险。除此之外，在拒绝鲁军取道方面，因皖系主要集矢于苏督，鲁军入长江，必先经过浦口等地，江苏可首先充当“拦路”作用^⑤，故陈光远也主之甚力。而在2月，李纯最终妥协，鲁军入境，段祺瑞一度欲以张怀芝代陈光远，更让其感到危机重重，转而寻找联合力量。

在财力方面，近代以来，受京汉铁路、江浙沪垄断性地位影响，位于长江流域的江西在近代贸易体系中却相对边缘^⑥；民国初年，江西地区财政收支体系相对混乱、收不抵支^⑦，与鄂、苏两省存在不小差距。1918年年初，由陈光远一手提拔的江西财政厅厅长杨庆鋆就称“本省财政困难，已达极点”^⑧，在应对客军驻扎、募兵援湘等问题上已相当困难，财力之限界又使诸多选择成为某种必然。一方面，为弥补财政困难，军政高层只得频繁选择向日本在九江开办的台湾银行借款^⑨，陈光远特意赴京运动，亦与需向中央协商款项有关^⑩，势必向诸方力量谋求转圜，此为张力之一。另一方面，江西为盛产稻米之地，南北战起，各路军米缺乏，纷纷来赣采办军米^⑪，尚能于财政收入有所补益，而又不能完全置境内客军、民众粮食维持于不顾，尤其涉及到此间商会的态度，则更为复杂微妙，此为张力之二。

1917年12月，皖系安武军为假道借屯，谒见陈光远时，特意向南昌总商会说明秩序问题，请其转知各商^⑫，足见商会地位之重要。商界首要挂虑者当为市场秩序和贸易利益，其对南北调和一事并无明确态度，1918年3月，鲁军抵达南昌，商会高层态度甚至相当热心^⑬。然而张怀芝自抵赣后，便积极谋求鲁盐南下分销鄂赣湘三省^⑭，夺取淮盐销路。对此，地方商界颇为不怿，淮盐公所长陈小梅迭次与榷运局长接洽，并请商会长龚梅生磋商办法，以鲁盐运销与淮盐价格相差

① 《致各省督军阳电》，1917年12月8日，《徐树铮电稿》，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3~4页。

② 《南京快信》，《申报》1917年11月24日，第3版。

③ 《陈光远亦主战矣》，《陈督商课安武军防赣》，《大公报》1917年12月4日，第3版。

④ 丁文江：《民国军事纪要》，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，第9~10页。

⑤ 《陈光远辞职声中之赣江湖》，《大公报》1918年2月19日，第3版。

⑥ 陈晓鸣：《中心与边缘——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（1858—1938）》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06页。

⑦ 《江西省志·财政志》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6~17页。

⑧ 《财政厅长定期晋京》，《大公报》1918年1月18日，第6版。

⑨ 《新闻报》1918年11月3日，第3版；《新闻报》1918年12月19日，第2版。

⑩ 《新闻报》1918年12月23日，第2版。

⑪ 《江西采办军米员来赣》，《大公报》1918年4月27日，第7版。

⑫ 《武汉恐慌中之江西》，《大公报》1917年12月18日，第3版。

⑬ 《张怀芝抵南昌时之见闻》，《新闻报》1918年3月15日，第5版。

⑭ 《江西鲁盐三十票运赣》，《大公报》1918年4月25日，第7版。

过巨、营业亏损不小为由，反对鲁盐入赣^①，张怀芝输兵销盐之“一举两得计划”遭到挫败。同年秋季，段政府因财政不敷，以印花税抵押借款^②，在取消印花税一事上出尔反尔，激起江西商界普遍反对，省长戚扬恐市面不稳，多次电告院部暂停施行^③，北京政府则将焦点转至江西印花处长姚深，称受其坚持前令发单、账单勒用印花之蒙蔽。为平息众意，商会领袖罗朗山宣传“不反对政府印花税法，系反对姚深蒙部施行勒用印花”^④，赣籍国会议员李学莲也返乡调查^⑤，反印花税风潮最终调停了结。在反对鲁盐假道、复征印花税等事件上，江西商界的集体反应，主要与利益相关，但无形中耦合于当时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之争、反对段政府谋借日款的背景。同年9月，南京商会联合南昌商会致电总统徐世昌，主张息争议和^⑥，并在陈光远赴京期间，复电北京商会，赞成和平联会^⑦，与其运动南北调和相呼应。商会通过直接介入南北和议大局，扭结为中央与地方之间一股重要力量。

在人际联结上，陈光远此前长期经营于京津、绥远等地，与江西地方联系甚少。1909年江西省谘议局召开第一届会议，议员大部分为传统功名拥有者^⑧。经过辛亥鼎革，李烈钧长赣，南昌临时议会改称省议会，多数席位为国民党议员占据，李烈钧专办江西的系列举措亦引起地方其他势力不满^⑨。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，省议会被解散，不少重要人物如议长任寿祺，副议长颜丙临、欧阳莘，议员魏调元、李儒修、杨赓笙、胡廷銮等遭到通缉^⑩，同年李纯督赣、戚扬任内务司长，后转为民政长^⑪，可谓另一次权势转移。戚扬原籍浙江绍兴，光绪己丑科(1889年)进士^⑫，与清末江西谘议局中黄大坝、叶先圻等老派绅士均有密切交往，长赣几年内也培植了较大势力。

随着1916年省议会复会，各派势力再度复出，绅士集团在传统渊源基础上，开始了新的分合。一批赣籍士绅前往中外新旧势力汇集、为南北所重而自成一特殊区域的上海^⑬。1917年9月，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，也吸引了一批江西籍绅士南下。这批旅沪、旅粤赣绅大多兼备新学旧知，基本上为早期同盟会会员，曾任职于李烈钧督赣时期的革命政府，担任过首届国会议员，部分为政学会成员，与西南实力派有一定联系。他们纷纷电告“和平”“护法”之意，大多倾向南北调和^⑭，与陈督态度不无相通之处。此外，陈光远与1918年8月北京政府选出的新国会亦存在密切联系^⑮，旅京赣籍参众议员基本属安福系、研究系，多为清末致仕，与实业界、教育界联系较广，在地方社会具有较高地位和影响力。与省长戚扬长期在赣，和地方势力的联系根深蒂固不同，陈光远未表现出鲜明的派系倾向，反而能够联结各方力量，斡旋于南北、新旧之间。

① 《江西鲁盐销赣未解决》，《大公报》1918年6月5日，第7版。

② 《财政部与土商之合同》，《申报》1918年9月3日，第6版。

③ 《新闻报》1918年12月22日，第2版。

④ 《赣总商会之特别大会》，《申报》1918年12月19日，第7版。

⑤ 《新闻报》1919年1月26日，第2版。

⑥ 《新闻报》1918年9月27日，第3版。

⑦ 《新闻报》1918年11月2日，第2版。

⑧ 李平亮：《卷入大变局：晚清至民国时期南昌的士绅与地方政治》，经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211~212页。

⑨ 金冲及、胡绳武：《辛亥革命史稿》第4卷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1625页。

⑩ 《政府公报》，1913年10月13日。

⑪ 骆宝善、刘路生编：《袁世凯全集》第26卷，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86页。

⑫ 《戚扬任赣内务司长之原因及历史》，《时报》1913年9月27日，第7版。

⑬ 《上海特别通讯》，《大公报》1917年11月29日，第3版。

⑭ 《赣议员鼓动陈督》，《大公报》1918年1月18日，第3版；《陈督派任议长赴湘接洽》，《大公报》1918年1月19日，第6版。

⑮ 《江西参议员之递补者》，《大公报》1917年11月13日，第3版。

在此意义上，相对于陈志让提出“军人领导绅士”的政权形态^①，所谓的“北洋军阀”与地方社会之间也并非畛域分明，以赣督为代表的江西军界实则更深刻地卷入了地方社会的若干互动，乃至相互激荡、互为借力。

但是地方权势主体内部也存在多重分歧。1915年12月，财政部允准九江弛米禁^②，由于稻米分销内地利润不及出口至外埠，外销成为米商普遍选择。1918年后，随着入境客军增多，针对米粮外运造成本地米价高涨，总商会为回护军政界关系，直接要求米业公会减价^③，但因外运权限仍操于总会领袖之手，名为减价、实则内部利润不均，由此分歧渐生。所谓“米谷禁运”动议之提出，前期已带有内部互动之复杂背景。

商会内部的权力分配更是争夺激烈。1918年，九江商界领袖级人物舒先庚去世，此后九江商会会长期未能落定，“彼此各怀意见，兹闹不休，会务因之停滞”^④；而在南昌总商会选举中，巨商龚梅生、卢馥窗通过权势运作继续当选，却将印刷业、皮货业、磨坊业等小行业目为“非正当营业”，乃至不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，引发了不小的风潮^⑤。江西地区商业主要集聚于南昌、九江，各商帮辐辏，本地外来杂处，处理内部人际、利益关系颇为棘手，商会所能实质性联合的范围亦较为有限。

议会方面，清末民初在开办谘议局、学堂，乃至参与临时议会、军政府等事项上，上述旅京群体与旅沪、旅粤群体不乏交往共事，双方选举纷争并非单纯新旧、党派之别。但结合时局大势、利益博弈来看，不同群体所关联的地方势力在江西省议会内派系之争已表面化。以欧阳莘为代表的合群社，及以叶先圻、宋育德为首的谠言社，在议会选举、弹劾省长等问题上针锋相对、分头串联。

自1917年5月始，杨赓笙、欧阳莘、李儒修等合群社省议员，就提出弹劾戚扬省长的动议^⑥，随即遭到黄衍袁、饶正音等谠言社成员的反击^⑦，赣督对省长候补人选态度摇摆，更为双方角力留下空间，旅居外埠的上层赣绅多直接奔走其中^⑧。此外，谠言社的支持者多兼大股东、且与北京政府有密切联系，不乏资金来源，而合群社的经费则相对窘迫，双方于各项资源争夺甚力，相互攻讦亦早已见诸报端。《大公报》曾载一例颇能说明。前财政厅科员彭勃意图串通合群社议员，将余干煤矿私下转卖给三井洋行，但惧于实行，而被买通的议员坦然称：“正义报（引者注：该报由谠言社主持）与吾党平素反对，无人不知，只需在吾党报纸鼓吹鼓吹，人家就知道此事纯属党派关系，不肯信他”^⑨，足见议会内部之争已广为世人所知。1918年5月，第一届江西地方省议会期满闭会，此后议会选举更是乱象迭生，数月间全武行频频上演。“民官两系，相争甚烈，各去票费八万余……争斗几至流血，结果仍一哄而散，势非伤人闹至法庭，空无结果”^⑩，最终合群社龙钦海赢得正议长职位，副议长胡廷銮、饶正音则分别由双方产生，暂时达成某种妥协，但是议会种种腐败现象无疑使其声誉大为跌落。

① 陈志让：《军绅政权：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5页。

② 《九江准弛米禁之部电》，《新闻报》1915年12月12日，第5版。

③ 《江西禁止米谷出口之提议》，《大公报》1918年3月21日，第7版。

④ 《地方通信：九江》，《申报》1920年12月27日，第7版。

⑤ 《南昌总商会改选黑幕》，《时报》1918年4月3日，第6版。

⑥ 《赣省会弹劾戚省长之风潮》，《大公报》1917年5月10日，第6版。

⑦ 《赣省又有违法之议案》，《大公报》1917年5月16日，第6版。

⑧ 《赣省长运动挽留之黑幕》，《大公报》1919年7月29日，第6版。

⑨ 《赣省议员卖矿记》，《大公报》1917年5月27日，第6版。

⑩ 《新闻报》1918年10月1日，第2版。

教育界方面，李烈钧组建军政府后，任命宋育德为教育司司长，宋从此在江西地方教育中发挥着重要影响。从1916年宋育德主持的教育会来看，该会基本上集合了大量本地教育精英，如罗家衡、程时煃、欧阳祖经等留日人士，心远中学校长熊育锡、赣省中学教员吴大樽等江西地方新学从业者^①。宋育德本人在文教界的交际也相当广泛，其与张元济、蔡元培等人均有往来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风气开通。九江成为商务印书馆较早设立分局的地方^②，该馆刊布书籍成为当时江西青年学生主要阅读来源之一^③。熊育锡还曾函告在北大就读的赣籍学生苏芬，请其联系宋育德，以与蔡元培、胡适接洽^④，足证宋影响力之大。

然而宋育德长期把持的教育界，早已引起不少诟病。1916年袁世凯汲汲谋求称帝时，宋育德曾贸然取全体学界名义递交劝进表，为众人所不齿。且在教育会内部，其日益倾向于培养个人派系势力，拒绝新会员加入、不承认民国二年之旧会员，依托《正义报》为言论机关^⑤，实则与上述谠言社势力互为帮衬。1918年，宋育德与教育会中梅士焕、程臻、邱珍共同遴选为旅京安福国会议员，罗家衡、程时煃、欧阳祖经等原同盟会人士退出。派系与政争因素的加入，使原本颇有进步色彩的教育会带上了若干不稳定的因素。

1917年11月，许寿裳转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，其引入若干江浙系人士担任教育厅要职，同时邀请程时煃、匡文涛等学问根底深厚、思想趋新的人物加入^⑥。但自其组建人事始，就受到了传统教育界势力的干预。《申报》称“（许寿裳）到任以前颇有认真办事之意，讵到赣后为某方面势力所压迫，失其自由活动之本愿，……第三科长王经畲，于教育界资望尚浅，……讵某当道闻王系科员，临时请许前往，将名单更换，王为科长，匡为科员，发表后舆论大哗，省城各报无不肆抨击”^⑦。作为妥协，许寿裳调曾担任教育会调查干事的王经畲担任第三科科长，但若干纷争并未解决，并与此后五四运动中教育会和教育厅之沉浮相关。

二、运动兴起发展的助力因素

已有论者指出，近代以来传媒、社团等对于江西五四运动的推动作用^⑧，学生群体在集体情感和团体组织的引领下，率先走上街头，成为参与五四运动的先锋队伍。但在江西地区，其与上述若干权势主体的互动同样值得注意，后者在某些方面亦成为运动兴起发展的助力因素。

五四运动前夕，以反对开采城门山铁矿一事为重要节点，维护国家和赣人权利的呼声蔚然成风。虽然各权势主体内部暗流涌动，但在时局变化中，利益博弈与话语嬗变并存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九江城门山铁矿原在清末被盛宣怀购作私产，李烈钧督赣时被购归，但因赣宁战役发生而中断开采。1919年1月，由王揖唐领衔，联合赣籍参议院议长李盛铎、众议院议员饶孟任及其他皖系、安福系人士，申请领办仙居公司开采城门山铁矿，得到了江西实业厅厅长、贵州籍人士夏

^① 《江西省教育会民国五年职员一览表》，《江西教育杂志》1916年第5期，第135~140页。

^② 《张元济日记》上册，1917年3月24日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，第193页。

^③ 如袁玉冰在日记中，就多次记载自己前往商务印书馆购书，并购买阅读该馆出版之书籍。参见《袁玉冰日记》（手稿），（原名《中华民国八年学校日记》，北京大学藏），1919年9月17日、9月21日。

^④ 高平叔：《蔡元培年谱长编》第2卷，1920年6月12日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。

^⑤ 《江西教育界之大风潮》，《时报》1917年3月15日，第6版。

^⑥ 《江西教育厅呈送该厅职员名单履历册请核备文》，《教育公报》1918年第5卷第3期，第145~147页。

^⑦ 《赣省实教两厅之新声》，《申报》1917年11月24日，第6页。

^⑧ 曾辉：《关于江西五四爱国运动若干问题再探讨》，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19年第5期。

同龢的批准^①。消息传来后，顿时掀起轩然大波，以陈祖怡、黄为柏为代表的议员，开始在省议会积极活动，促使省议会电告北京政府农商部，反对李盛铎开采^②。结合当时背景看，该铁矿的开采实则涉及两层关系，一方面，因铁矿属省有产业，北京政府能否变相收归国有，乃至抵押日款，涉及到中央与地方、外交与国权问题；另一方面，因联名申请者多为皖系人物，又涉及到皖系与其他势力之争，适逢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议进入胶着阶段，使相关问题愈加微妙复杂。

3月21日，省议会致电粤军政府李参谋长暨同乡诸人，北京张绍轩（即张勋）暨同乡诸人，呼吁共同维护赣人权益^③。29日，以汤漪、汤祚贤等为代表的江西旅沪同乡会电呈北方代表朱启钤，将希图采办铁矿者指为“主战派之首领”，而“此案不特为地方矿权所关、且为和战问题所系”，与皖系此前参战借款、八年公债、凤凰山借款等案相挂钩^④，直击皖系痛处，将铁矿问题转化为南北和战之争，并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占据道德高地。南方主战派领导人李烈钧也公开通电要求保矿^⑤，旅粤赣绅甚至称“城门铁矿案争若无效，定请军府派兵来护，以为后盾”^⑥，态度更为强硬。然而北京政府农商部仍坚持认定办矿于法律及国权均无不合，要求实业厅速发矿照缴京^⑦，愈发激起省议会中活跃者的反对。

在此次事件中，主张维护赣人利益的群体占据了较多的社会资本和话语资本，凡被认为有碍矿权者均经历了一定的道德危机。如龙钦海、胡廷銮、饶正音三议长被指有入股仙居公司之嫌，在其他议员质疑下，不得不“表明心迹，焚香盟誓”，难掩忸怩之态^⑧。在查办实业厅长夏同龢、质问戚扬交还矿照问题上，谎言社议员因阻挠相关动议^⑨，为各界所不容，不得不另发起保矿会以抵制^⑩。虽然相关主体内部的裂痕依然存在，但是派系、利益之争已然与话语、道德站位交织在一起，在时代大潮冲击下，后者之重要性愈发凸显，与五四逻辑相互承接。

五四运动初期，学生首先联合商会，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，商会在若干活动中表现得较为强势，广大商民更是积极响应。5月6日，北京学生罢课消息传到九江，九江各学校联名致电政府，声援北京学生，九江总商会也同时致电“乞速电欧会代表抗争，为国家争生存，为人民免奴隶”^⑪。此后，学界与商界的联系愈加紧密。

一方面，罢市、抵货主张的实际施行需要商会的支持，因此，学生代表相当重视对商会的宣传与联络工作。23日，九江南伟烈学校及其他各高校学生均派代表赴商会协商，次日，九江绅商学界召开秘密会议，学生代表慷慨陈词，希望商会“毅力主持”^⑫。在举国风潮中，大部分基层商民不乏公益心与爱国情感。6月12日，除商会副会长辜葆城所开商店及七八家钱业店铺不肯关闭外，大部分商店坚持罢市^⑬，学生则组队维持秩序，起到了较好的配合作用。两日后，九江和上海取同一节奏预备开市，引发部分街头苦力工人的不满，学生亦在劝解双方、平息冲突中所为

① 《王揖唐等为领办仙居铁矿呈》，1919年1月22日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：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·工矿业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583~585页。

② 《新闻报》1919年3月5日，第2版。

③ 《新闻报》1919年3月21日，第2版。

④ 《江西旅沪同乡会公呈》，1919年3月29日，《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》，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209页。

⑤ 《新闻报》1919年4月3日，第3版。

⑥ 《新闻报》1919年5月20日，第3版。

⑦ 《新闻报》1919年4月5日，第3版。

⑧ 《新闻报》1919年4月3日，第3版。

⑨ 《新闻报》1919年5月8日，第3版。

⑩ 《新闻报》1919年5月17日，第3版。

⑪ 中共九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：《中共九江市党史大事记：1919—1949》，1994年，第1~2页。

⑫ 《浔绅商学界之对外会议》，《申报》1919年5月24日，第8页。

⑬ 《九江罢市风潮详情》，《时报》1919年6月19日，第1版。

甚力^①。这一过程中，青年学生的行动力和良好形象得以显现，时《申报》称誉道：“不论聚集多人，只要学生一言，无不立散，即八九岁小学生，人民必信仰”^②。在江西修水县，返乡学生也通过热情宣传和真诚行动，使地方绅商人士深受感染，商会领袖当即表示对不再贩售日货的提议极为赞同^③。南昌地区，在学生演讲、传单宣传的影响下，钱业若干商民自发出资翻印“中国学生团所发表之二十一条中日密约共万余份，邮寄各属及各乡村，俾人人得知国家状况危亡，以力图自救”^④，进一步提升到思想自觉层面。

另一方面，在反对议员加薪一事上，商界的加入明显增强了学生行动的力量。5月26日，省议会开会议决议员加薪一倍^⑤，实为省长戚扬袒护之结果^⑥。消息传至学生群体中，顿时引起轩然大波。江西由于地处内地，思潮文化与京沪等发达地区存在一定位差，梁启超的国民思想和王阳明的修身传统在青年学生中有着深远影响。以袁玉冰为例，其更关注五四之内面——即卖国贼人格不修所致危害，在此背景中，闻及议员加薪，更增添其对于国民性、人格修养之怀疑与失望，其言“阅报见民报大多皆系省议会加薪事，而中庸报未见只字，且往报且为议会辩护，彼二报之价值可知矣。天下最丧心病狂、利令智昏，孰有过于本江西之省议员乎”^⑦，可一窥当时青年学生之心态。因此，在加薪内幕被揭露后，学生表现得颇为激动，5月30、31日，学生赴议会要求与议长交涉受阻，于是大起忿激，部分学生强行入内打伤议员、打破器物^⑧，与议会的矛盾迅速激化。而当学生与商会代表结队共赴督军署时，却得到了督军陈光远的重视，其表示可“顺应民意、解散议会”^⑨。随后，九江总商会、教育会也联合发电反对议员加薪^⑩，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运动的影响力。

在部分事项上，学界表现出对商界的依靠，似助长了商界自恃之意。如在磋商联合办理国货维持会时，学生表示“力多求商会多负责任，务期达到目的，无论应如何进行，均惟商会是听”^⑪，部分商界领袖甚至直接提议该会应以“商界”冠名^⑫，为此小起纷争。但总体上在运动初期，商会给予的支持应得到肯定。

此外，作为地方实权人物的江西督军陈光远，在运动初期对学生行动较为宽容，给予运动以一定的空间。尽管维持秩序仍是其第一考量，但在蓬勃发展的学潮中，其基本上顺应大局，尽量避免与学生直接发生正面冲突。5月14日，军民两长电告府院“学生愤慨情形”^⑬，此后，进一步转呈江西学生的爱国情感^⑭，以示地方之民气。九江罢市过程中，受军政界指示，军警在维持秩序之外并未干涉相关活动^⑮，使运动初期学生与商民的爱国抵货行动得以顺利进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赣督表态也与时局中的诉求相缠绕，曲折地作用于地方运动的发展上。同时期，陈光远与

^① 《九江强迫开市之风潮》，《新闻报》1919年6月19日，第1版。

^② 《九江罢市之商讯》，《申报》1919年6月18日，第8页。

^③ 《赣属学生两大会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7月13日，第6版。

^④ 《赣人爱国热力之耐久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8月22日，第6版。

^⑤ 《新闻报》1919年5月28日，第4版。

^⑥ 《赣省长与省议会之活剧》，《大公报》1919年6月18日，第6版。

^⑦ 《袁玉冰日记》(手稿)，1919年5月29日。

^⑧ 《南昌学生反对省议员加薪》，《新闻报》，1919年5月30日；《各校学生之坚决》，《新闻报》1919年5月31日。

^⑨ 《各校学生之坚决》，《新闻报》1919年5月31日。

^⑩ 《九江近事》，《申报》1919年6月2日，第8页。

^⑪ 《赣省商学两界之联合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7月15日，第6版。

^⑫ 《江西国货维持会成立》，《大公报》1919年7月19日，第6版。

^⑬ 《新闻报》1919年5月14日，第3版。

^⑭ 《新闻报》1919年6月10日，第3版。

^⑮ 《九江罢市之商讯》，《申报》1919年6月18日，第8页。

苏督李纯措意许久的南北和谈陷入僵局，因此，其一面敲打段系“外交吃紧”的困局，一面表示解决外事，首先应致力于国内和议，方能于“民本”“民心”有所裨益。与此同时，旅沪赣籍士绅罗家衡等亦与之同声相应，电告全国反对北京政府向旧银团借巨款及在巴黎和约上签字^①，直接助推了五四运动的声浪。

地方教育精英组成的教育会作为社会团体，在相关问题上的处置更为裕如，不仅多次借给学生联合会开会场地^②，且在不少议题上对学生界有所声援。在运动风潮中，不少中小学校长及教员对于学生行动也相对宽容，如就读于南昌省立二中的袁玉冰即记载，该校老师们多与学生谈及国事，宣传使用国货、痛诋军阀黑暗^③，在学生力持罢课时，除口头多加劝说外，亦未与学生产生激烈冲突^④，这些进步教员的思想倾向，一定程度上也激励了学生运动的发展。

相对于湖北、浙江等在五四期间直接发生流血冲突地区，江西五四运动的整体形式颇为完备、参与群体广泛，运动的环境相对宽松，与这些潜在的助力因素不无联系。江西多地进行了罢课、罢市活动，九江地区还有工人罢工的支援。结合袁玉冰的日记来看，当时在南昌地区，各校学生互相联络、利用公共空间开会议事等行动均相对自由，学生游行亦多次诉诸地方权势主体^⑤，对之抱有一定的期待。

三、运动深入：围绕米谷禁运、救济浔路的多方角力

但与此同时，此前社会格局中已有的种种裂痕逐渐浮现，米谷禁运、救济浔路两大议题既鲜明地体现了江西五四运动的地方性，却也折射出学生行动的影响与困境。

上文所述，米谷禁运本与商会内部多重矛盾有关，而在五四运动大潮中，禁止江西米谷出口，以阻止“转售东洋、接济口粮”^⑥，势必转化为地方五四关注的议题之一，且尤为青年学界关注。

此前在罢市问题上，商界领袖如九江商会副会长辜竹平、南昌商会会长龚梅生及部分大会董，就多持排斥态度，与众多商民情感、学界诉求相对立。6月28日，九江首先实行米谷禁运，然而成效并不理想，此后一直处于“似禁非禁”的状态。辜竹平本人即兼营米粮贩卖，其仍可依托个人权势私自出口，不少资本雄厚的米商也可通过疏通关系，继续贩运。正如《申报》的点评一针见血：“禁米之后，小本经纪当然不能贩运，其强有力之米商既有操纵之权仍可乘机偷运垄断利权，如价稍平又可以便宜收进”，同时偷运还能省去捐输负担^⑦，愈发造成利害不均。

此举引起主要由中小米商组成的米业公会的不满，8月14日，该会函致学生联合会，请其与商会接洽、停止代运，同时检查米船、罚办充公^⑧，折射出其对于五四运动中、作为一股颇有生机力量的学生行动的期待。学生联合会随即多次派代表与商会接洽，表示山东问题未解决，主张开禁接济东洋，于国权上不合；军阀战乱、民生凋敝之时，开禁更造成米价高涨、民食不敷^⑨。

① 《众议院公报》1919年第9期，第69~70页；《众议院公报》1919年第11期，第61页。

② 《九江学生会议纪事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7月2日，第6版；《袁玉冰日记》（手稿），1919年6月5日、11月16日。

③ 《袁玉冰日记》（手稿），1919年5月15日、1919年12月28日。

④ 《袁玉冰日记》（手稿），1919年12月15日。

⑤ 《袁玉冰日记》（手稿），1919年5月8日、5月10日、5月12日、6月8日。

⑥ 《赣各界驳斥弛米禁说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11月21日，第6版。

⑦ 《九江贩商禁米之内幕》，《申报》1919年8月12日，第7页。

⑧ 《米业呼助学生》，《新闻报》1919年8月14日，第6版。

⑨ 《奸商运动开米禁之失败》，《晨报》1919年11月7日，第3版。

在痛陈道理外，学生界还组织游行演说团，散发白话传单，向工商界宣传米禁与民生的重要关联^①，并在此后组织了几次联合游行，以实际行动表示抗议^②。

在此之后，学生界与上层商绅的关系迅速恶化。9月15日，南昌学生联合会为响应京津沪各界联合会之要求，拟组织江西省各界联合会，却遭到南昌总商会的消极反抗。商会在入会问题上几经反复，以发泄对学生此前捣毁日货、米谷禁运之不满。其害怕学生势力藉联合会之成立“日益膨胀”，因而准备“乘此时表示不赞成，减学生之锐气”。针对商会之态度，大会最终议决其加入与否本无足轻重^③，等于双方矛盾已直接公开化。

地方上层商绅之强势，背后亦与军民两长态度有关。自陈光远督赣以来，财政恐慌就已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，1919年上半年仅能依靠“地丁及茶木米粮等出口之厘税得以临时敷衍”^④，米粮出口攸关财税收入，一旦取消，造成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，故其对于开放米禁实际抱有支持态度。在接见学界代表时，军民两长及财政厅长往往措辞含糊，并未实际采取措施之本意。如财政厅长宣传所谓“三年弛禁方法”，主张监控米价、抽税调节、划分地段，方案看似复杂庞大，却难有实现之可能^⑤。督军陈光远曾一度以保障民生及反对资助战争为由，表示将继续维持米禁^⑥，此后，却也做“以退为进”之举，表示赣米出口后之具体情况官厅亦难以知晓，“最好请学生代官厅帮忙”，“如查得赣米出口后，有在何处、卖与某国情事，即请该地学生联合会告赣”^⑦，显然也不切实。面对米商运动弛禁与学生坚决主张严禁之间斗争日益尖锐，官厅即已采取一种骑墙态度，甚至宣布“对米禁无成见，唯以真正舆论为标准”，诸多米商即不惜收买报纸、学生，不过给金钱运动以更大空间^⑧。

学生界激烈反对议员加薪事件后，议会与学生界“恶感极深”^⑨，在诸多问题上已有争执。其卷入米谷禁运的直接原因，则在于该事又挑动了其内部派系争夺这一敏感神经。11月22日，各方代表在省议会讨论米谷禁运善后问题，该会达成“如米价涨至一千，即由会咨请禁止”之意见，实则学生已做出很大让步，而议论时，“合群、谠言互为诋毁，来宾大笑”，现场实在不堪^⑩。合群社议员中不乏关注学潮民食者，其首先试图介入调和，然而由于谠言社代表副议长饶正音一再推诿，调停会亦一拖再拖，此后的会议上，主张与官厅互商救济方法的合群社议员黄用中、谢鸿藻、陈祖怡等，与谠言社黄辉、葛第春再度针锋相对^⑪。由于大力运动弛禁的出口米商以抚州浒湾居多^⑫，而饶正音本人亦为抚州人，其在会后不仅毫无行动，且宣称：“我是抚州人，抚州是产米的地方，我若不主张开禁，何以为地方代表呢？”^⑬至此，米谷禁运动议已几乎落空。翌年4月，在米价超过此前议定价格时，学生会代表再赴议会要求按约定颁发禁令，其不过推诿而已^⑭。随着赣南方面李烈钧军队进攻日迫、皖直关系愈发不稳，更加上本省军饷困难，6月29

① 《赣各界反对开米禁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11月18日，第7版。

② 《赣人反对弛禁之大游行》，《申报》1919年11月28日，第7页；《赣省米谷弛禁斗争尖锐》，《晨报》1919年12月2日。

③ 《赣人决组各界联合会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9月15日，第6版。

④ 《赣省之经济恐》，《大公报》1919年9月10日，第6版。

⑤ 《江西各界代表之米禁谈话》，《申报》1919年11月22日，第7页。

⑥ 《陈光远维持米禁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11月12日，第6版。

⑦ 《陈赣督平息学潮之政见》，《大公报》1919年12月27日，第6版。

⑧ 《赣省米谷弛禁斗争尖锐》，《晨报》1919年12月2日。

⑨ 《时报》1919年7月10日，第3版。

⑩ 《新闻报》1919年11月24日，第3版。

⑪ 《陈赣督平息学潮之政见》，《大公报》1919年12月27日，第6版。

⑫ 《米谷开禁所闻》，《新闻报》1919年10月30日，第6版。

⑬ 中国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：《五四运动在江西》，1989年版，第138页。

⑭ 《赣米涨价将重申禁令》，《新闻报》1920年4月6日，第5版。

日，督军陈光远绕开议会、直接提交财政厅布告米谷弛禁^①，各方争执一年之久的米谷禁运事告一段落。

五四期间，旅居外埠的上层士绅同样通过各种途径介入进来，使得本地学生与政界争持不下的若干议题更为复杂。以学生界亦热心投身的救济南浔铁路一事为典型。自清末江西京官李盛铎主张修筑南浔铁路以来，由于规划不善、效益不高且路政败坏，该路早已负债累累，本属历史疑难问题。1918年日本以催缴该路债款为由，汲汲谋取该路管理权，并准备进一步将路线推广至闽粤两省^②。为弥补资金缺口，两年间，李盛铎频繁向日本台湾银行及英美资本借款^③，相关举措早已引起地方社会不满。1919年5月，南昌地方报纸再次披露南浔铁路左支右绌的财务状况，台湾银行亦不同意南浔铁路公司将未能偿付的息金转为新债，扬言若不立即清偿，“则把这条铁路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”^④。五四前夕，李盛铎卖城门山铁矿一事本已引起不小风潮，旧浪新潮叠加，救路维权更成为江西地方五四运动中普遍呼声。

6月3日，九江总商会分函总商会、股东会，指出“时机危迫、再难延迟”，更应合谋补救^⑤。与此同时，九江学生界联合社会其他各界讨论救路问题，但会议上，众人多无何以实际措置的头绪，刘黛青等女教师不禁认为，“兹事重大，似非我们人民所可办到，应呈请督军省长力予维持，以利进行”，相对而言，学生界代表则颇为坚定，指出“此种责任系在人民，若人民不能自立，官厅亦岂能为力”，但在具体方案方面，其主要设想依托人民的自觉心募集筹款^⑥，这对于巨额债款而言似属杯水车薪，但是“人民”作为一个整体话语的提出，明显带有着五四时期独特的进步意义。7月24日，由军绅商学各界代表组成的江西省救济南浔铁路会召开，可谓是五四时期江西地区一次空前的大联合，该会以唤醒赣人集体自觉为标旨，点出南浔铁路与江西全省、东南各省乃至全国的紧密联系^⑦，表现出从学生界传递至社会整体的“大联合”精神。

然而在此后商议具体救助方法时，各方主张分歧，而核心问题仍难以解决。由社会各界组成的南浔铁路救济会主张通过发行储蓄有奖证券集资^⑧，但其成员中有不少基督教界人士，以该奖券性质类似赌博，而不甚赞同^⑨，且该券因带有获利性质，与其他省份部准发行的慈善票券不同，北京政府方面又需疏通^⑩，更增添一重困难。在集资救路思路外，部分旅沪、旅粤赣绅却认为，借款一事十余年来已无底限，根本解决应在于整理路政，包括公债拆折、股权重组^⑪，而这就触及到旧有股东的核心利益，且大股东如吴钫、黄大坝、闵荷生，多为安福国会中保守派巨绅，其与主张整理路政甚力的代表如谢远涵，本扞格不入，此皆为张力所在。

与此同时，由淮盐公所陈小梅牵头，以商会为主体发起了“卖米救路讨论会”，设想在沪市米价上涨时卖米集资，然而商会在米谷禁运与弛禁之争炽热之时提出这项动议，本身就是与学界博弈的反映，在讨论会上，不少参与者亦态度消极，不仅怀疑卖米利润根本不符合预估，且与学

① 《赣省米谷弛禁已实行矣》，《申报》1920年6月29日，第7页。

② 《赣浔路权与借款》，《大公报》1918年12月23日，第3版。

③ 《新闻报》1919年1月26日，第2版；《新闻报》1919年4月20日，第3版。

④ 《寇克报告》1919年5月，《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（1912—1949）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323页。

⑤ 《九江近事纪要》，《时报》1919年6月3日，第6版。

⑥ 《南昌妇幼医院之大会》，《时报》1919年6月16日，第6版。

⑦ 《赣省救济浔路之大会》，《申报》1919年7月24日，第7页。

⑧ 《南浔铁路救济会忠告股东书》，1919年9月，《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（1912—1949）》，第559页。

⑨ 《信徒不以赌博兴公益》，《兴华》1919年第16卷第36期，第15页。

⑩ 《救济浔路之一夕话》，《申报》1920年2月27日，第8页。

⑪ 《南浔铁路根本改良计划》，1919年12月1~2日，《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（1912—1949）》，第558页。

界闹出大风潮时，还须“先疏通学生联合会，然后方可进行”^①，既反映出学生界已被正视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，但也说明商会这一救济方案于情理上更有颇多困难。从该事直接关涉的主体来看，北京政府交通部也深知该路积弊深重，不愿接受；李盛铎擅自借款，本不合法、其分配运作更内幕重重；股东会巨绅不仅利益攸关，对地方社会自行运作种种联合会涉足路政，更心怀不满，乃至宣称不承认九江联合会^②。无怪乎人在报端评论，在救济南浔铁路问题上，“察赣人心理，大抵各怀主张，不能合力齐心，故议论多而成功少”^③，相关问题之激荡仍在继续。

四、潮起潮落：运动中的权势嬗变

历史主体既是“剧作者”又是“剧中人”。由上文可见，江西地方社会深刻地卷入了五四运动的各项议题之中，五大潮流亦对相关权势主体的地位嬗变产生一定影响。

清末以来地方自治就成为民间吁求之一，但这种“自治”尚且与“官治”色彩相交织^④。从江西地方社会的情况来看，五四运动的兴起发展催生了国民身份意识上的“自治”观念，并落脚于地方自治和个体自治之上。一方面，在罢市抵制、米谷禁运、救济浔路等议题上，维护家乡权益与维护国家权益的意义被打通，社会各阶层以地缘观念为基础或多或少进行过一定的合作。另一方面，“赣人”也成为集体行动的话语和被诉求的对象，各方均以代表“赣人利益”自任，分别串联旅居各地的同乡团体，“赣人治赣”成为笼罩式话语，亦在不同语境中被赋予了相异内涵。

省长戚扬的地位沉浮即与之相联。省议会内部派系分化由来已久，此前反对势力为引入同调，弹劾省长之声早已出现^⑤，戚扬也针锋相对，公开数落“自治”所谓种种流弊^⑥。而在五四期间，戚扬因交还矿照、袒护议会加薪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不仅学生反对议员加薪运动热情高涨，而且地方实力派绅商以“赣人治赣”为由，既主张排戚，又要求抵制由北京政府选派、与地方无甚联系的丁乃扬^⑦，议员却也因事发后戚不予保护而集体移恨之^⑧。派系对立、利益争夺与道义指责叠加在一起。面对民气高涨的形势，赣督陈光远对于慰留其同僚亦不积极^⑨，一时间省长戚扬的地位岌岌可危。

但在1919年八九月间，国民党系军事领袖李烈钧再次图赣，陆续派遣远征军到达赣南附近^⑩，江西地区南北对峙的军事形势再度紧张，李烈钧亦以“赣人治赣”为由，反对直隶出身的陈光远^⑪，更增添其危机感。

为防止两种呼吁“自治”的话语合流，陈光远对学生运动及排戚动议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。9月25日，因民系主持的《匡报》披露陈光远赞成安福系头领王揖唐为北方总代表一事，陈光远便对相关报纸衔恨在心，要求取缔报纸、管控言论^⑫。学生因受闽案刺激再度游行，呼吁解决其

^① 《赣垣卖米救路讨论会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20年1月23日，第7版。

^② 《时报》1920年12月10日。

^③ 《五四运动在江西》，第157页。

^④ 颜军：《“自治”与“官治”：从地方自治改革看清朝的灭亡》，《广东社会科学》2014年第6期。

^⑤ 《赣省会弹劾戚省长之风潮》，《大公报》1917年5月10日，第6版。

^⑥ 《赣省长之自治意见》，《申报》1917年5月5日，第6页。

^⑦ 《赣省长运动挽留之黑幕》，《大公报》1919年7月29日，第6版。

^⑧ 《戚扬恋栈之暗》，《大公报》1919年9月17日，第6版。

^⑨ 《赣省长与省议会之活剧》，《大公报》1919年6月18日，第6版。

^⑩ 《时报》1919年8月28日，第3版。

^⑪ 《赣南形势紧急之续报》，《大公报》1919年9月7日，第3版。

^⑫ 《陈光远取缔报纸》，《时报》1919年9月25日，第5版。

一直诉求的米禁、浔路等相关议题，陈光远决定采取强制措施。12月14日，其要求警厅封闭学生会，造成学生群情激奋、集体罢课^①，江西地方五四运动的空间暂时收紧。

此外，伴随北洋军阀内部的裂痕愈发凸显，段系主持的北京政府试图更动陈光远职位，更让其对戚扬抱有“同病相怜”之感，陈在试图维持自身权势之外，亦尽力为戚扬说项^②。1920年始，部分旅京赣籍安福巨绅如李盛铎、蔡儒楷、吴钫等，却也以“赣人治赣”为名暗中运动，希冀谋得省长一职，无疑与江西军民两长相水火。陈光远不仅严厉压制当地报纸，对地方士绅也疑窦丛生。报载其与一士绅与谈，后者不得不着意解释“京沪各处之政客辈，侨居省外，既无财产之牵连，复有党派之关系，所以提倡自治，希图个人活动，若我等则安处家乡，久托庇督帅之下，不特不赞成自治”^③，可见地方社会环境整体上的紧张状态。

经过五四运动的大潮，江西军政首长陈光远、戚扬虽然维持了自己的位置，但是由于五四所引发的国民情绪、自治诉求为各方所运用，根本上侵损了其权势地位，其逐渐转向与学生、士绅疏离乃至对立的态度，人际联结、地方资源等方面均受削弱，此时可谓已种下权势陨落的种子。1921年，戚扬被迫离任，一年后，陈光远最终也因难抵南军进攻而去职。

五四期间，以许寿裳为代表的教育厅却直接经历了最大的沉降。许本人曾为留日学生，在日期间加入光复会，与鲁迅、蔡元培等北京学界交往甚密。其本人此时对于新文化并未呈现出很浓厚的兴趣，周作人曾在回忆录中记载，当鲁迅拿几册《新青年》见示时，许却认为“这里边颇有些谬论，可以一驳”，仍以“民报社时代的眼光”看待^④。可见，许寿裳主张甚力的民治主义，与新文化运动的追求仍有一定距离，这可作为观察其在地方五四运动发生时心态的一条线索。

教育厅联结官学两界，在处置罢课游行等问题上常处维稳与尊重民气的两难之间，层层压力被转嫁过来。京沪地区学生运动消息刚一传来，江西地区学生界便积极响应，但许寿裳不得不出头要求各校校长提高警惕，禁阻学生游行，并提前组织考试放假^⑤，直接与诸多激进学生的情绪相抵牾。此外，由于财政困难，南昌地区教员的下半年经费一直被拖欠^⑥，亦对教育厅感到不满。由此可见，学生、教员双方与教育厅间存在一定的裂痕。

同样，围绕着教育长及地方教育权力分配，“赣人教赣”的提法占据了较大的话语权，地方上反对教育厅的群体纷纷以之为武器。“自治”理念由地方延伸到教育界，不仅是整体社会思潮逻辑发展的必然，而且也是与京沪地区先进思潮联动的结果。其时北京学生联合会与教育部的颉颃对抗臻于白热化，其所宣传的“教育自决”传播到江西地区学生群体之中^⑦，愈发引起学生界共鸣。北京学生会还声援江西学界，批评江西教育当局对学生会被摧残、教员无法维持生计的现状不闻不问^⑧。

但是，相关话语的运用也夹杂了其他目的。因议会加薪、学生游行捣毁议会，省议会已积恨于教育界，要求省长惩办学生、撤换校长，而许力持不可，双方产生激烈冲突，厅长许寿裳、科长程时煃曾一度提出辞职申请^⑨。而拥护省长之谠言社与宋育德主持的教育会互为表里，其力主

① 《陈光远封闭学生会》，《时报》1919年12月14日，第6版。

② 《南昌特别通信》，《时报》1920年4月24日，第5版。

③ 《赣督不准赣人之鼓吹自治》，《新闻报》1920年10月30日，第6版。

④ 周作人：《知堂回想录》，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300页。

⑤ 《新闻报》，1919年5月12日；《新闻报》1919年6月6日；《九江罢市之经过》，《申报》1919年6月16日，第8页。

⑥ 《赣省之经济恐》，《大公报》1919年9月10日，第6版；《袁玉冰日记》（手稿），1919年12月2日。

⑦ 《袁玉冰日记》（手稿），1919年12月27日。

⑧ 《北京学界之新潮流》，《大公报》1919年12月20日，第6版。

⑨ 《江西政界之暗潮》，《申报》1919年7月4日，第7页。

“赣人教赣”，实际上更指向排斥许寿裳，代替以赣籍人物、扩张自己势力的目的^①。

1920年5月，江西学生联合会响应上海学生总会的呼吁，罢课达一周之久，与教育厅复课要求产生龃龉^②，在督军省长的压力下，10名学生被开除，教育厅长许寿裳顿时成为学生群体攻击的焦点。江西学界公开通电质问教育厅长，指责其整顿江西教育不力、阻挠罢课、开除学生，与其自身所持“德谟克拉西主义”相背离，不啻以“强权压服公理”^③。省议会、商会也纷纷运动，谋求转圜，称“为学生力主公道”^④，以博得社会声誉，许寿裳的社会处境已相当艰难。

许寿裳本为新派人物，但在五四期间，其并未顺应学生情感主动而为，且在多重因素限制下难以施展，以至于以消极角色存在于江西五四运动中，最终不得不于同年年底去职^⑤。不过，本应富有民主进步色彩的“赣人自治”提法也日趋形式化，江西地区各权势主体的人事变动依旧一波三折。

五、结语

邓野曾指出，五四运动不单纯是一次“下层学运”，而是“既是学潮、又是政争”的政治运动^⑥，落脚到相对基层的地方社会，同样需要考察该地既有的权势格局，以了解运动发生、发展的背景，以及运动相关议题与地方社会的交织关系。

论者普遍指出，江西五四运动阻力较小、发展相对顺利，但在督军态度、江右文化风气的普遍阐释外，更需要结合历时性维度、置身具体时空背景深入挖掘。就1917~1920年江西地方社会格局来看，军绅商学界内部情况相对复杂，亦形成了各自的运作策略。军界实权人物既要维系与地方商会、议会的合作，取得物资、人际联结方面的支持，又不得不顾及民生秩序、集体情感，以维持自己的社会认受性，并借助地方社会彼此的互动，实现对地方的控制。绅商界尚未形成某种单极格局，而是在传统的社会网络基础上，开始新的分合，不仅表现为派系、利益之争，也有对变动时局中话语的争夺。无论是商界、议会还是教育会，都与学生行动有密切交集，这些既有互动不自觉地在某些侧面对五四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学界作为与新思潮距离最近的群体，表现出更多理想主义情怀和行动精神。在五四运动中，旧的议题如米谷禁运、救济浔路生发出了新的意义，江西学生界通过直接与京沪地区联动，发动抵制日货、罢课罢市等活动，将新的青年形象和时代课题呈现在江西地方社会面前。

五四运动也让既有社会积弊更赤裸裸地呈现出来。督军的微妙态度，根本上脱离不了军阀巨额消耗、财力资源不济、社会联结脆弱的逻辑限制；商会从初期支持转而消极抵制，乃至米运问题上与学界针锋相对；议会尚为自身稻粱谋，至此社会声誉已跌落难存；教育厅受重重限制、缺乏主动作为，这些都是江西五四运动中充满波折之处。旧的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，“进步”和“联合”何以延续？与袁玉冰类似的青年开始了深切的自省，在此后的发展中，新的联结和主体亦逐渐得以改造和创生。

(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871)

[责任编辑：侯竹青]

^① 《南昌特别通信》，《时报》1920年4月26日，第5~6页。

^② 《赣学生罢课问题之讨论》，《申报》1920年5月11日，第6页。

^③ 《赣学生质问教育厅长书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20年6月11日，第6版。

^④ 《赣人为学生力主公道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20年6月21日，第6版。

^⑤ 《赣学生欲驱逐许寿裳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20年9月22日，第6版。

^⑥ 《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95页。